

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进程与经验

王彬 胡玉翠

摘要：新中国70年来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解决的是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的是制度确立后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解决的是文化发展如何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则着眼于文化建设如何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化建设在完善制度的同时也逐步从外在工具性目的向凸显自身目的性转变，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时空方位和主要矛盾、国家总体布局和文化双重功用平衡以及文化的本质和目的层面总结了70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20.01.007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总体性成就的取得与文化建设存在着多维度的映射和共生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而从文化视角切入我们可以更好理解70年的发展。毫无疑问，70年的文化建设内容是丰富的、庞杂的，但主线始终是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和人的发展展开的，由此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一、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尽管制度的变革、历史的积淀、时间的淘洗会显现出文化的损益，但是新中国70年的文化建设是一个具有历史整体性的集合。依据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巩固、完善进行历史时期的划分不仅不妨碍它的整体性，而且可以通过这一划分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文化建设的起承转合，凸显文化和制度变迁的关系。

（一）“破”与“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化建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建设也迎来了崭新的时代。这一

作者简介：王彬，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胡玉翠，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2019T120598），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19CDSJ15），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

3. 以“扫盲”为着力点的文化普及和社会主义教育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文化主体的素养关乎文化建设的质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基于当时的状况积极开展以扫盲为着力点的文化普及，同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 扫盲运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 5.5 亿人口中有 4 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 80%，‘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①，人口的文化素质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拦路虎。1950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热潮，无论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部队机关人们都积极投入到学习中；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6 年，周恩来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截至 1964 年，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初期的 80% 下降到了 52%。(2) 社会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时，全国 90% 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而农民由于受封建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影响，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不强，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缺乏认同感，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也缺乏必要的认识。为此，我们党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采取中央统一领导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教育寓于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宣传队，通过广播、黑板报、冬学积极开展宣讲工作，组织编排群众喜爱的文艺节目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了广大群众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

(二) “双百”与“双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发展，解决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时期，既有“双百”方针和“双用”方法的规律性探索，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思考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大格局，也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迷失和曲折发展。

1. 重塑繁荣文化的“双百”方针

方针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针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文化人的改造上的某些“过火”行为所导致的噤若寒蝉的文化氛围，毛泽东意识到这不仅无法进一步肃清非马克思主义，长期来说也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因而在 1956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我们党长期一贯坚持的方针，它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不仅符合繁荣文化的基本规律，而且推进了文化领域的民主自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信、开放、宽容的文化心态，其正确性也得到历史的检验，对于推动艺术创作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创新文化运用的“双用”方法

社会主义文化改造解决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问题主要从阶级角度考虑如何对待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封建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一无是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必然要立足于中国现实思考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遗产和西方外来文化。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法，并强调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不能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而是应该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②。“双用”方法的创新，一方面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宏大的时间和空间格局，显现出社

^①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5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3 页。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气度和胸襟，另一方面不仅正确解决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而且为接续传统和民族精神、融入现代世界文化体系奠定了基础。

3.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迷失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思想意识形态的肃清问题。这个过程从和风细雨演变为后来的疾风骤雨，主要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发生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已经让位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对思想意识形态问题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中共九大做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从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失误更深层次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在这个时期主次问题判断的失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努力恢复经济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是着眼于夯实物质基础，但是一旦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任务，则是颠倒主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造成了工作重心的偏离。事实上，所谓文化大革命只是以文化为导火索，更多的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所以政治与文化的联姻究其根本还是解决政治问题，文化则在这场运动中完全迷失了自身。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的文艺创造不仅作品寥寥可数，而且塑造的都是政治色彩浓厚、极具脸谱化的形象。文艺为政治服务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文艺本身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功能丧失，难以有触及人性灵魂的好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割裂开来，而是说文化要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发挥引领时代精神的作用，如果文化完全被政治淹没，被理解为单一化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则必然迷失自身，由此带来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干枯。

（三）新范式与新战略：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功用的转型

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发展，解决的主题是如何在文化范式的转换中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这个时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互动共生中文化本身的目的性被激发出来，逐步从改革开放前的工具性转向工具性和自身目的性并行的轨道上来。

1. 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引领文化范式转换

文化领域的改革作为70年文化建设这一集合体中的重要一环，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进而是体制机制变革，其特殊性在于从具体可操作的体制机制上着手而不是像以往单纯在制度纯粹性这个宏观问题上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由此文化建设逐步走出困境，开启崭新时代。（1）思想观念变革。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认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①。思想观念的变革集中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范式转换。这一根本性转换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中重新建构起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邓小平认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②，同时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③。这一时期“文明”和“文化”共用隐含着我们改革的指向：即以文明融入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因为文明是一元的、普适的；以文化体现民族化，因为文化是多元的、本土的，两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共存不悖、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结合。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中国的崛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提出进一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本土化。(2) 体制机制变革。改革的春潮催生文化体制改革，这一过程主要历经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到南方谈话，主要是告别以往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调动文艺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南方谈话到新世纪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完善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三是新世纪以来到党的十八大，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文化产业布局的形成、文化市场主体的成熟、文化管理体制的逐步健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①。从文化体制改革找到突破口到文化产业的兴盛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思想观念的变革和实践创新互动的结果，同时改变了人们对文化功用的认知，文化从以往单纯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转变为文化也是生产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2. 实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科教兴国的文化战略

改革开放后文化范式的转换促使文化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教兴国两大文化战略正是围绕经济建设展开的。(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精神文明进行全面解释，“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②；1982年，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进党章；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关涉改革开放成败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将精神文明建设上升到重大战略的高度。时隔十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加强，其重点就是以“文”化“人”，人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逐渐凸显出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引下，我们党适时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义”、“三观”、“三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从根本上把人的培养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2) 科教兴国战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的姊妹是科教兴国战略，如果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偏重人的精神世界塑造，那么科教兴国战略则主要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提供智力支持。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③；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④邓小平一系列响亮的口号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都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为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奠定坚实基础。两大战略从根本上扭转之前文化单一的意识形态功用，文化尽

① 蔡武主编：《筑牢文化自信之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40年》，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管仍然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但是它开始聚焦文化的主体“人”，发觉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这是文化自身价值的体现。

3. 推进惠及大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经济发展奠定的物质基础以及改革开放激发的文化繁荣使文化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可能。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提出要实施重大文化服务工程、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标志着我们党领导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入新的阶段；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组织运行机制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城市主要是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建设，农村主要是广播电视网络覆盖、乡镇文化站建设、农村书屋建设。从组织运行机制来说，首先是以“服务”为重点让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运转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其次是整合部门资源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再次是发挥社会力量共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共建共享的格局。

（四）“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是如何更好地彰显制度的优越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文化自信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 提出以“三种文化”为奠基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文化自信的提出首先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清醒认识，随着国际竞争加剧，文化软实力已经被提升到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同等的高度，因而顺应世界大势努力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其次体现了我们党基于文化历史积淀的自信，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作为我们历史的积淀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保持自信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再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激烈碰撞的全球化时代确立了自身的价值立场，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内在精神支撑；最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过70年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有理由自信从而保证以坚定的步伐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 全方位推进以文化强国为目标的文化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文化生生不息、繁荣兴盛的根本力量，是建设社会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创新在指导方针、体制机制、实践应用层面开启崭新的时代。一是在指导方针层面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方针是 70 年来我们党首次正面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同时也唤起中华民族集体的情感认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共生。二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在文化领域依旧是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习近平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①，要在文化管理模式、文化市场体系、文化监管体制等方面真正为创新铺平道路。三是实践应用层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化与高科技的结合以及“文化+”“+文化”为创新带来超乎想象的力量，它主要体现为文化产业的兴盛，以文化原创力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3. 实施文明互鉴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进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确认的同时也开启文化交流互鉴的崭新时代。诚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开启文化交流互鉴，但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输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我们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注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思考中国与世界的文化问题。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理念、中国价值开始影响世界，中国方案逐渐被世界认可。首先，我们倡导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扭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②。其次，以文明平等破除文明优越论，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只有树立平等思维、破除文明优越论才能实现交流互鉴。再次，以文明包容促进文明创新，历史证明文明只有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不断吸收来自不同文明的智慧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活力，从而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二、新中国 70 年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 70 年来，文化建设从社会主义初期探索的迂回曲折到新时期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文化建设不断开创崭新局面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探索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文化建设要以制度为依托并服务于制度的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主要解决的是文化与制度脱节的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走上了文化与制度相适应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支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就是如何通过文化与制度变革走上现代化道路，关于先变革文化还是先变革制度，我们与西方国家相反，西方很多国家是内生现代化，文化变革先于制度变革，即思想文化观念变革为制度的变革奠定基础，最

^①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77 页。

^②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载《求是》2019 年第 9 期。

终走向现代化，而我们是应激型现代化，只有先经过激烈的制度变革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的结构，进而变革文化走向现代化。

回顾70年的文化和制度变革，最根本的目标指向是现代化，这是我们一切变革的总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提出科学文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但是1964年三届人大会议上“四个现代化”变成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文化现代化消失了，这一导向不仅仅是取消文化现代化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之前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和方法都隐没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是解决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的问题，但是放弃现代化的追求，仅仅从意识形态着手解决文化与制度的冲突，实际上是窄化文化，导致文化进入到一个封闭单一的系统，造成内部和外部互动的终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重提“四个现代化”中恢复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文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渐从封闭僵化走向开放吸收，与外部的交流互动逐渐使文化脱离封闭单一系统进入到自由开放的系统，从“引进来”转为“走出去”，不仅改变了文化系统的单一封闭，也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而文化与制度变革都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它是文化发展的驱动力，也能防止文化固步自封。

目标确立后，如何处理好文化与制度的辩证关系至为关键，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会面临文化与制度脱节的问题，完全相适应并使两者进入良性互动共生状态需要不断创新。回顾70年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坚持让文化适应制度，用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蓝图来规定文化的发展，而不是通过文化的发展来促进制度的完善，最终的结果是文化建设和制度完善两败俱伤；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与创新，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这是重新恢复现代化的内生之路，即文化变革推动制度变革完善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从本土文化出发，以文化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提供沃土，进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二）文化建设要准确把握时空方位与社会主要矛盾转换

所谓时空方位是指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时间和空间共在的场域中的坐标，它必然地要以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观念形成连续性集合，也要以国家之间已然并存的空间意识构筑分离共生的格局。我们只有明辨时空方位方可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而国家社会时空方位的演变则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的。因而，时代坐标、空间格局和社会主要矛盾是分析70年来文化发展演变的切入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时代方位的研判问题，事实证明正确的时代坐标感是我们走向胜利的保证。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①，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每一阶段的成功与曲折恰与对时代方位的判断密切相关，而明确时代方位要有大、中、小三重意识的时代观，即要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从近代百年文化史、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文化建设着眼。从目标设定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断言：“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

^①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①，这里的“新”从时代观来看是迥异于传统与近代文化的，文化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最鲜明的特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提文化现代化的目标，面向世界文明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为世界现代化的多样化提供中国范例；习近平强调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标注文化发展目标。毫无疑问，每一个阶段目标的设定都是立足当下、回望历史、面向未来准确把握时代的体现。从聚焦问题来看，一些重大判断的得失也与时代方位认知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法不仅终结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纷争，也是处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正确方法，但是回顾 70 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文革时期一度完全抛弃传统文化，隔断与传统的关联就是缺乏时代观的体现，习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提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再次彰显了强烈的时代方位感，只有以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时代感才能铸就文化的辉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从中国—世界的空间格局中回看 70 年的文化建设，我们经历了向世界学习到影响世界的转变，在世界意识形态对立格局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之路，并开始以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引领世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处在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依然提出“洋为中用”，要向世界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重提“洋为中用”，并在实践层面打开中国向世界学习之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世界格局下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与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互动共生。70 年的文化建设证明，处理好文化发展的中国—世界格局是不二法门，而文化在中国—世界格局中必然要面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过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对立导致中国与世界隔阂，最终影响文化的发展，而改革开放后并不从意识形态出发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而是把文化交流作为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工具，不仅避免了文化的闭塞，也为意识形态交流找到柔性力量。

国家社会时空方位的演变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历史充分说明，党和国家事业能不能顺利发展，同我们能否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②，但是仅仅对社会主要矛盾有正确的判断是不够的，关键是要通过变革解决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成就正是通过不断变革体制机制取得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美好生活的需要”较之以前“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上了一个台阶。因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从以往文化需求的物质性向精神性转变的基础上向创造性迈进，即文化按照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开始满足个体创造性的需求，也凸显我们党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三）文化建设要整体谋划并处理好目的性与工具性的功用关系

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并列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70 年的文化建设我们得出的最宝贵经验：一是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二是文化的自身目的性功用和工具性功用共存并适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3 页。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6 页。

发挥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70年的文化建设中得到印证。改革开放对于文革的纠正就是将过去颠倒的关系重新恢复。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在发展生产力，搞好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才能谈精神文明，过去饿着肚子搞文化革命把国家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而夯实经济基础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化与经济共同构成国家总体布局的铁三角，尤其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而我们需要在总体布局中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

其次，文化自有其独特的功用，但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相互影响构成的整体又使它有了工具性功用。从现有的实践可以看到，“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运行使其具有政治性或统治性；在经济领域的运作使其具有经济性和产业性；在社会领域的运转使其具有社会性或“服务性”^①，而文化对社会和生态领域的影响也将在日后凸显出来。70年文化发展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文化从工具性功用向自身目的性功用转变，文化担负起以文化人的功能，真正把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这是我们逐步与世界接轨并在国家总体布局不断细化的过程中使文化是其所是、回归自身的体现；另一方面，文化的工具性功用随着国家主导方向的转变，由新中国成立后较多担负政治性功用向改革开放后较多担负经济性功用转变，并逐步发挥社会性和服务性功用。应该说文化自身目的性功用和工具性功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回顾70年的文化发展我们认识到应该以文化自身目的性功用为主，并平衡文化的工具性功用。

（四）文化建设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落脚点

70年的文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从根本上说它是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但是唯“物”并不是固于物，而是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研究社会发展主体“人”在改造物质世界并同时改造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人化的世界，文化其实就是人化的结果，文化与人始终处于互动共生的关系中，因而文化的本质决定必须要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求，我们对于文化的认识聚焦于意识形态层面，也就是说主要是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出发、以人民的强大力量通过斗争的方式建构新文化，文化与人的关系也被简单地局限于意识形态文化对人的塑造。换句话说，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文化，个体的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运动中被淹没。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化本质和目的理解的片面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重新把文化聚焦于人，强调以文化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撑的重要性，文化与人的关系进入互动共生的阶段。随着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和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我们对于文化本质和目的的认识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社会形态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仅注重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而且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

^① 李山：《中国农村文化政策70年：话语形态及其演变脉络》，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三、结语

70 年的文化建设成就是瞩目的，这与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完善相统一密不可分。世界著名学者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文化与制度在互动共生中积累的势能使得文化在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上开始发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在已然规划好的蓝图上继续奋进：首先，文化发展依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在新的历史方位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攻坚克难，续写新时代的篇章；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70 年积累的经验教训是前进道路上的参照，为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懈奋斗；最后，文化建设要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要在理论上着力阐述新中国 70 年的伟大成就并积极搞好对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使文化真正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崔桂田）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 页。